

何国忠学院派散文忧患意识的三重维度

纪学玲、郭紫薇*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摘要

本文以何国忠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灯影》《塔里塔外》与《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为研究对象,从“忧患意识”的角度出发,提出其散文书写呈现出“感时忧国”“感物吟志”与“人间情怀”三重维度。文章通过文本细读与历时性梳理,指出三者由外而内、层层递进,构成其由现实关怀转向人文反思的思想轨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其叙述风格与知识分子身份,分析其如何以理性克制的表达方式,将忧患意识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续的书写形态。本文认为,何国忠的“学院派散文”不仅体现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时代经验,也呈现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展开的知识分子书写实践,为理解马华文学中学理探索与人文关怀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路径。

关键词: 何国忠, 忧患意识, 学院派散文, 人间情怀, 马华文学

* 纪学玲, 博士研究生,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 cereenkee@gmail.com; 郭紫薇, 马来亚大学文学暨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 florencekuek@um.edu.m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Anxiety Consciousness in Hou Kok Chung's Scholarly Prose

KEE Hap Leng, Florence KUEK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u Kok Chung's campus prose trilogy—*Ban tai gu deng ying*, *Ta li ta wai*, and *Wen hua ren de gan qing shi jie*—through the lens of “anxiety consciousness.” It argues that his scholarly prose develops along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concern for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 “reflection on personal aspiration,” and “humanistic concern.” Through close textual analysis and a diachronic approach, the study demonstrates how these dimensions progress from external realities to inner reflection and ultimately to broader humanistic engagement.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ng an analysis of narrative style and intellectual identity, the article shows how Hou Kok Chung transforms anxiety consciousness into a sustained and structured mode of writing through a restrained and rational narrative voice. His scholarly prose not on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Malaysi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ut also represents a mode of intellectual writing shaped within a specific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is study offer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inquiry and humanistic concern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Hou Kok Chung, anxiety consciousness, scholarly prose, humanistic concer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一、前言

何国忠(1963—)不仅是一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 20 世纪 80 年代马华学院派校园散文的重要奠基者,其文学创作深刻折射了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大学求学时期,他活跃于校园文学和学生运动,在马大中文系完成学士、硕士学位后赴英国攻读博士,日后曾从政并长期任教于大学,这种多重身份孕育了其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的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灯影》(1989)、《塔里塔外》(1995)和《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皆发表于其马大求学及执教期间,以知识分子的视野书写时代,展现出古今忧患传统在当代的回响。何国忠的“忧患意识”具有多层内涵:既体现为对族群命运的感时忧国,也包含对理想抱负的感物吟志,最终升华为站在人类高度的人间情怀。他那理性克制、不渲不染的叙述风格,更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文字写照。本文以“忧患意识”为分析主轴,通过对《班荇谷灯影》《塔里塔外》与《文化人的感情世界》的文本细读与历时性梳理,探讨何国忠散文书写中的思想展开路径。相较于既有研究多以“家国忧思”概括其创作内涵,本文尝试从结构层面加以重构,提出“感时忧国—感物吟志—人间情怀”的三重维度,以揭示其忧患书写由现实关怀逐步展开至人文反思的内在逻辑,并据此理解其学院派散文¹的思想特质与发展脉络。

二、忧患书写的开端:何国忠与学院派散文的奠基

(一) 校园散文的兴起与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初,马来西亚高校兴起了一股校园文学热潮,一批大学生作者相继崭露头角。早期的校园散文多以浪漫抒情或幽默活泼的笔调描绘校园生活,如叶宁的《飞跃马大校园》(1982)和瘦子的《大学生手记》(1983)营造出令人神往的“马大神话”,作品风格轻松易读,充满生活情趣,在当时广受欢迎。陈大为将这一时期的作品定义为“校园生活散文”(陈大为,2009,页 83),强调其轻巧笔调和日常记录性质。然而,社会巨变催生了新课题:当代华裔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开始融入校园文学。何国忠与同时期其他大学生作者,虽同属校园散文阵营,但他的作品风格与前辈大相径庭——不再满足于抒发个人情怀,而是以更深沉的眼光介入现实,将校园散文从自娱抒情的天地引向关照现实、介入时代的新路径。他的首部散文集《班荇谷灯影》标志着校园散文由“轻”转“重”的转型,被学界视为“校园散文从轻转重的里程碑”(钟怡雯、陈大为,2007,页 137),预示着校园文学进入了关注社会人文的新阶段。何国忠以“读中文系的小

¹ 本文所称“学院派散文”,主要指由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散文书写,其特征兼具学理意识与个人表达。此一概念与一般所称“学者散文”有所重叠,但本文更强调其在学术规范、理性思维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张力与调和,而非单纯以作者身份作为界定标准。

子”身份开创了“学院派散文”风格，为马华校园散文奠定了厚实基础，也让忧患意识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重要底色。

（二）忧患意识与“先天下之忧”的现代阐释

“忧患意识”作为文学母题，在何国忠的散文书写中呈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取向。近代学者徐复观在《中华人性论史》中指出：“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徐复观，1969，页19）这一界定强调了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自觉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换言之，忧患并非纯粹的情绪反应，而是一种指向现实处境的敏锐感知及其所伴随的担当意识。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忧患意识”，并非单纯的情绪表达或现实焦虑，而是一种包含责任意识与历史前瞻性在内的精神自觉。在何国忠的散文书写中，这种意识不仅体现为对现实困境的敏锐感知，也通过不同层次的文本展开，逐渐形成具有内在结构的思想表达。

这一意识可追溯至中国传统士人“先天下之忧”的精神谱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命题，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社稷安危与民生疾苦，并在历代文人书写中不断得到承续与转化。在何国忠的创作中，这一传统并非简单沿用，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获得新的指向。

20世纪80年代，在马哈迪执政时期，华教发展受到冲击，华裔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对受限，华社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均面临多重压力。何国忠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大学，一方面参与学生运动以争取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散文书写反思华社处境与文化出路。其早期创作所呈现的焦虑与思考，可视为传统“先天下之忧”精神在当代马来西亚语境中的一种延续与转化。在此意义上，忧患意识成为何国忠介入现实的一种书写动力，使其散文不仅回应具体处境，也逐渐展开为对文化与人文问题的持续思考。

（三）校园散文三部曲与写作演进

何国忠的校园散文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历时发展脉络：从青年时期的现实关怀，逐步转向学者阶段的反思性书写，其忧患意识也随之不断展开。他的校园散文“三部曲”构成了这一变化的基本线索。《班荇谷灯影》摆脱早期较为轻快的校园书写，直接回应马来西亚华社的现实处境，展现出青年学子鲜明的公共关怀；《塔里塔外》则将视野由校园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领域，通过书写学术理想与

现实身份之间的张力, 呈现出对体制与自我处境的双重反思;《文化人的感情世界》进一步转向文化与人文议题, 在反思文化传统与精神传承的叙事中, 其思考逐渐扩展至更为长时段的文化问题。

通过这一由近及远的展开过程, 何国忠的忧患书写不再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族群处境, 而是在具体语境中逐步形成更为多层次的思想取向。

三、忧患意识的三重维度：从家国到人文

既有研究多从“家国忧思”切入何国忠的忧患意识, 强调其散文在马来西亚华社语境中的现实介入。然而, 若仅以“感时忧国”概括其散文精神, 难以呈现其忧患书写的层次结构与内在展开。细读何国忠校园散文三部曲《班荇谷灯影》《塔里塔外》与《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可以发现, 其忧患意识呈现出由外而内的三重维度: 关注社会现实的“感时忧国”、反思个体精神处境的“感物吟志”, 以及指向更广泛人文关怀书写取向的“人间关怀”。三者相互关联, 并呈现出由现实关怀向人文反思逐步展开的关系, 共同构成其散文思想发展的基本路径。下文即以此三重结构为分析框架, 考察何国忠忧患意识在不同时期散文书写中的展开方式及其意义转向。

（一）感时忧国：华社困境的镜像书写

“感时忧国”是何国忠忧患意识的重要起点, 也是其校园散文书写的基础维度。这一层面源自他对所处时代与华社现实处境的敏锐感知。20 世纪 80 年代, 马来西亚的教育与文化政策对华社形成一定限制, 高等教育录取配额的调整削弱了华裔子弟的升学机会, 华文教育与文化亦面临边缘化压力。在这一背景下, 身为大学生的何国忠不再安逸于“象牙塔”内的浪漫情调, 而转向对现实处境的关注与回应, 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很能心领神会”(何国忠, 1995a, 页 105)²。

在校园时期, 他一方面参与华文学会等学生组织活动, 另一方面通过散文书写思考华社处境与族群前途。在其第一部校园散文《班荇谷灯影》中, 多篇文章直接回应时代冲击。如〈时代的眼睛〉一文, 他冷静分析华社前景的不确定性, 并提出追问: “这一代的华裔大学生是否会成为将来族群中的眼睛呢?”(何国忠,

² 本文所引《班荇谷灯影》主要依据十方出版社 1995 年版。该版本对早期发表作品进行了编排整理, 与初刊于报章或杂志的原始文本在篇章次序与个别文字上或有差异。本文在不影响论旨的前提下, 统一采用此一通行版本。

1995a, 页 104)。这一提问既指向现实困境,也寄托了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期许,即在动荡环境中保持判断力与责任感。这种关怀延续了传统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取向,但在何国忠的书写中,并未停留于抽象表述,而是落实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观察与反思。其“家国之忧”更多体现为对族群处境的持续关注,以及对现实不平等现象的理性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何国忠并未将华社困境仅归因于外部环境,而是同时纳入对内部问题的反思。在其笔下,外在制度压力与内部观念局限相互交织,构成一种需要被同时面对的现实结构。在〈疏忽了的关心〉一文中,他通过连续追问的方式,揭示华社对大学生处境的普遍忽视:

华裔社会的观念是:能将他们送入大学,他们应该已心满意足,是不应该有什么奢求的了。因此华裔大学生的心态如何?他们在大学如何度日?大学的制度如何?在种族的比例有差距而学生又有种族两极化的倾向时,他们如何自处?大专法令的内容是什么?学生会又是怎么样的组织?为什么当今许多政坛的顶尖领袖都是出自学生会?一大堆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但是大部分的华裔社会人士都回答不出,事实上他们似乎也不想去回答。(何国忠,1995a,页 51)

通过这种层层推进的诘问方式,何国忠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引向族群内部的思想状态,使“感时忧国”的书写同时具有反思与自省的意味。其文字整体呈现出理性克制的风格,但在分析之中仍可见其对华社处境的持续关注。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其校园散文逐渐超越一般校园题材的抒情取向,转向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回应,构成其忧患意识展开的起点,成为 80 年代马华文学中一道独特而厚重的风景。

(二) 感物吟志: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困境

如果说“感时忧国”主要体现何国忠对时代与族群处境的关注,那么“感物吟志”则标志着其忧患意识由外在现实转向个体精神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在这一维度中,其书写焦点不再仅停留于公共议题,而是逐渐转入对自身志业、学术选择与现实处境之间张力的反思,呈现出由社会关怀向个体内省的转向。

“感物吟志”一词源于中国古典诗学中“吟物寄志”的传统,即通过对外在事物的观照,寄托内在的志向与情志。在何国忠的散文中,这一传统被转化为对个人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其忧患意识由此呈现出内化趋势:既延续对现实的关注,也转而指向个体志向的困境与意义。

何国忠立志很早。他很早就决心要修读人文学科, 且在高中时期就已立定要走学术的路。在其代表作〈读中文系的小子〉一文中, 他以第三人称回望这一选择, 写了这样一段告白, 将个人兴趣与人生方向并置呈现:

他景仰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修读人文学科的, 而探讨人性本质又是他最大的兴趣, 当初他是秉着兴趣进入文学院, 最后仍然以同样的理由选择中文系, 他有一个信念, 只要念得好, 他一样能扬眉吐气! (何国忠, 1995a, 页 31)

这段自述显示, 他将“探讨人性本质”的兴趣转化为对人文学科的自觉选择, 并将其视为值得坚持的精神路径。然而, 正是在这一理想主义信念的驱动下, 他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对人文学科相对不利的社会语境之中; 加之中文系所承载的文化责任与现实出路之间的落差, 这种志向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逐渐成为其忧患意识在个体层面的重要来源。在同一文本中, 他进一步揭示作为中文系学生所面对的处境: 一方面承载文化传承的期待, 另一方面又需直面经济压力与学术边缘化的现实。这种双重压力, 使其忧患意识由对族群命运的关注, 逐步转入对个体身份与价值的反思。文中两度出现的诘问——“读中文系难道一定得和钱途挂钩?”——正体现出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持续挣扎。

这一层面的书写, 并未脱离现实关怀, 而是在个体经验中重新组织对现实的理解。在〈传灯〉一文中, 何国忠进一步呈现出人文学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他写道:

在这里读过一点中文的人都清楚, 似乎是读越高的中文, 就需要有越大的勇气: 要顾及出路, 要顾及不会忽略国语和英语, 要顾及自己的文化情怀不会参杂有任何的政治意识。要想到许多文人徘徊在文化良知和现实之间那份复杂的心情, 心里就不能释怀, 更觉得这条路分外难行。(何国忠, 1995a, 页 124)

人文学科的选择在此具体化为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径, 其中既包含现实层面的压力, 也涉及文化立场与学术自觉之间的张力。文章题名“传灯”, 既呼应文化延续的象征意义, 也隐含作者在学术与现实之间反复权衡的处境: 既需承载文化责任, 又难免面对个体层面的不安与迟疑。由此可见, 其忧患意识在此阶段虽仍关联族群与文化处境, 但已逐渐转入对学术理想与个体处境之间关系的反思。

进入《塔里塔外》与《文化人的感情世界》时期, 已是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师何国忠, 将其忧患视野从象牙塔内扩展到社会文化现象, 并以更为冷静的书写姿态反思自身的学术执着与角色定位。在这一阶段, 其“感物吟志”的维度进一

步深化：既延续对现实的敏感，也更侧重对学者身份与生活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动与静〉一文即呈现了这种状态：

九个月内连续参与筹办两个活动，在学者‘应该甘于寂寞，应多研究写作’的理念上，的确让我觉得不安心，担心误了正业。但在感性上，偶尔的筹办活动应是我生命中自然的过程，也许是身体中就存在着一些动的基因，又或者是现实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刺激。（何国忠，1995b，页95）

在这一层面上，其忧患意识已不再仅指向外在困境，而是延伸至对学术理想、生活节奏与社会参与之间关系的反复权衡。“感物吟志”由此呈现出中介性的结构位置：既承接前一层的现实关怀，也引向更深层的人文反思，使何国忠的忧患书写在个体经验中获得更为复杂的展开。

（三）人间情怀：文化与人文取向的展开

在“感时忧国”与“感物吟志”的基础上，何国忠的忧患意识进一步转向更为开阔的人文关怀层面。若说前两重维度分别对应现实处境与个体经验，那么这一层面的书写则将视野延伸至文化与人类精神处境，呈现出由族群关怀逐步转向“人间情怀”的思想取向。

“人间情怀”作为一种学者姿态，其理论内涵可参见陈平原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的相关论述。陈平原指出，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而一旦选择“议政”，则源于“有情、不忍”，是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陈平原，1993，页80）的自觉行动。此一立场强调，学者在专业研究之外，可在是否介入现实论争之间作出判断，并凭良知与道德，对现实社会保持持续的关注与反思。

在散文集《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中，何国忠的书写不再集中于具体社会议题，而是通过对“人”的经验性叙述，展开对文化与精神问题的思考。其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多从日常经验出发，在平实叙述中呈现对人性、历史与文化处境的理解。例如，他在怀人散文中通过追忆恩师与前辈学人，其书写触及文化延续与精神传承的问题；在涉及辜鸿铭等跨文化人物“错位”命运（何国忠，2002，页125-142）的叙述中，则呈现出个体在多重文化语境中的位置与张力。这类书写并未直接展开宏观论述，而是在具体人物经验中逐步引出更为广泛的文化关怀。

与此同时，其关注范围亦延伸至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与生命意义等议题。在〈直观心情〉（1995b）中，他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谈论环境问题，提出城市发展与

文化品位之间的关系;在《花开花落》(2002)中,他借伍尔芙的悲剧感悟与生命体验,思考个体自由与存在困境之间的张力。这类书写既继承了儒家“士人”的责任伦理,又融入了现代人对个体生存处境的反思,使其忧患意识不再局限于特定族群或历史情境,而是在更广泛的人文问题中获得展开。

在这一层面上,其书写方式亦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取向:由直接的社会批判转为以文化叙事与经验书写为主要路径,通过较为间接的方式回应现实处境。这一转向在既有研究中亦引发不同理解。钟怡雯认为何国忠不再书写“经国大志”而转向人文情感世界,或许是一种“对社会改革无力的掩饰”(钟怡雯,2009,页138-139),即在现实层面难以展开有效介入,只好退而求其次转向文化书写以寄托理想。相较于这一理解,本文更倾向于从书写路径的调整来理解这一变化:何国忠并未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是通过文化与经验层面的展开,对现实问题进行持续而较为含蓄的回应。从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精神融合的视角来看,这一转向更接近于表达方式的调整,而非立场的退却。正如传统文人常以隐晦笔法抒写家国兴亡,现代学者也可以借助研究成果与平实叙述来践行文化使命。何国忠正是在“学院派散文”的书写中将两者糅合,将“家国忧思”转化为较为理性、带有学理性的文化关照,使书写在不同层面之间形成过渡与延伸。在此意义上,由直接论述转为间接呈现,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回避,而体现为知识分子在复杂语境中对表达路径的重新选择。

从这一维度来看,“人间情怀”并非脱离前两重维度的独立层面,而是在现实关怀与个体反思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何国忠的忧患意识既保持对现实的敏感,也转化为对文化与人文问题的持续关注,使其散文书写呈现出由外而内、由近及远的整体结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其学院派散文可理解为一种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展开的知识分子书写实践,并自然引向对马华文学中学理探索与人文关怀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四、叙述风格的理性克制:知识分子性格的文本投射

(一) 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

何国忠的散文在表达忧患时,他始终保持理性克制的基调。在同时期校园作者中,其笔调显得尤为冷静,这种“不渲不染”的叙述方式不仅构成其个人风格,也与其知识分子身份中理性与节制的倾向密切相关。潘碧华指出,80年代校园散文的忧患书写多弥漫着“忧虑、孤愤、沉痛、压抑性的情绪”(潘碧华,2004,页292-294),作者往往流露出浓烈孤独愤懑之感。相比之下,何国忠的书写同样源

于对华社前途的关注，却较少采用情绪化表达，而是在平实语调中展开分析，将这份“感伤”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塔里塔外·后记》中，他坦言：“我始终清楚，大欢和大痛都是人间微不足道的涟漪……在自己书写的过程中，耳边常会响起大文人、大学者的声音，因此下笔用字多了一层犹豫。”（何国忠，1995b，页 192）这种写作时的“犹豫”，并非懦弱退缩，而体现为将个体情绪置于更长时段的文化与历史视野中加以调节，使表达趋于审慎与克制。相应地，其散文较少直接宣泄情绪，而是通过反思与分析来承载忧患意识。

这种独特的写作取向并非无迹可寻。在《万里长风》中，何国忠推崇胡适“理智而冷静”的笔风，赞赏胡适下笔稳重，“既不惨兮兮，也不飘飘然”，而是胸怀文化良知与社会公道，以长远眼光审视现实。胡适“没有沉痛的悲哀，没有狂热的情绪，因为他看的是长远的中国”（何国忠，1995a，页 143-146），强调以长远视角审视现实。他的叙述策略亦深受周作人“冲淡”风格影响。在《苦雨斋将不知是什么样儿了》中，则引用周作人关于“含蓄、平淡”的写作评价：“未尝不骂世，未尝不暴露黑暗，未尝没有一种微涩的苦味，但他写的东西较多含蓄……一直都表现一种平淡、祥和和恳切的风采。”（何国忠，2002，页 84）由此可见，他推崇“含蓄、平淡、祥和”的美学风范，有意识地吸收并转化这一传统，使其书写在表达沉重主题时，仍保持节制与内敛。感情上“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行文节奏上“不徐不疾”——这大抵就是他刻意经营的散文风格。

何国忠在《班荇谷灯影·后记》（1995a）中曾直言：“我不太相信灵感。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大体上都和阅读、观察、思索有关。”（何国忠，1995a，页 177）这一表述显示，其忧患书写建立在经验积累与理性反思之上，而非即时情绪的流露。经历阅读和观察后所得的感悟，再经深思熟虑，纵使胸中曾有愤懑，付诸笔端时已非倾泻式的控诉，而是凝练为何国忠式的“不渲不染”的忧患叙述。所谓“不渲不染”，并非削弱情感，而是通过节制与转化，使忧思在叙述中呈现为持续而稳定的思想张力。在这一意义上，前文所论忧患意识由现实关怀到个体反思再到人文层面的展开，也在表达方式上获得了相应的支撑。

（二）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的调和

若从书写方式进一步追问其形成机制，可以看到何国忠散文中的理性克制，与其“传统文人”与“现代学者”双重身份的交织密切相关。作为 80 年代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承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在

现代学术体制中接受训练, 形成理性分析的思维方式。这种双重背景, 构成其忧患书写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从传统文人的角度看, 其作品延续了关注公共事务与文化命运的书写取向。曾维龙称其为“从传统思想文化之中寻找对应之道的传统知识分子”(曾维龙, 2011), 这一判断在其早期作品中已有体现, 如〈残存记忆中的腾跃〉(1995a)和〈时代的眼睛〉(1995a)等, 均以华社处境为关注核心。但其关注并不限于现实利益, 而往往从文化与历史层面加以思考。

与此同时, 现代学术训练则为其提供了另一种表达路径。在散文中, 他常结合史料与论述, 对社会与文化现象加以分析, 使其书写不流于单一抒情, 而具有一定的论证性。《文化人的感情世界》(2002)中对文化人物的描写, 往往通过历史语境与文本分析展开,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理意识, 为作品注入了更多“学院派”的思想深度。可见, 传统文人的情怀与现代学者的理性在他笔下水乳交融: 前者赋予作品以温厚的人文底色, 后者确保了论述的严谨与深刻。这种融合使何国忠的散文既有情感温度, 又有思想力度, 在马华文学中自成一家。

在这一双重视域下, 可以理解其为何不采用直接的政论书写, 而倾向于通过文化叙事与经验描述回应现实问题。钟怡雯曾认为, 其由公共议题转向人文情感世界, 或反映出对现实改革的无力感(钟怡雯, 2009)。然而, 从书写路径的角度来看, 这一变化更接近于表达方式的调整: 通过较为间接的方式, 对现实处境进行持续回应, 而非简单的退出或回避。

由此观之, 何国忠既是一位深受传统文人影响的“士”, 又是一位融入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 两种身份并行不悖, 并在他的写作与人生道路上不断调和。通过传统文人的关怀取向与现代学者的理性分析在其散文中形成互动: 前者提供问题意识, 后者塑造表达方式。两者的结合, 使其忧患书写既不局限于情绪表达, 也不转化为单一论述, 而是在不同层面之间保持张力。最终铸就了其“学院派散文”的核心风格与精神内涵。

从叙述方式与身份结构两方面来看, 何国忠散文中的理性克制, 并非单纯的风格选择, 而与其知识分子位置密切相关。其书写既回应现实处境, 又保持分析距离, 使忧患意识在表达上呈现出节制而持续的特点。这一特征与前文所论三重维度相互呼应: 在现实关怀与个体反思之外, 其散文通过理性化的叙述方式, 将忧患意识进一步稳定为一种可持续展开的书写形态, 并自然过渡至对知识分子书写实践的整体理解。

五、结语：先天下之忧的现代回响

在大学时代出版首部校园散文集《班荇谷灯影》之后，何国忠被马华文学界誉为“90年代的星光”（陈蝶，1991，页177），寄予厚望。他不负众望，凭借独特的“学院派散文”风格在1980-90年代的马华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迹。他不仅以“校园三部曲”奠定了学院派校园散文的基础，更以深沉的忧患意识为精神内核，提升了这一体裁的思想高度和人文深度。回顾马华校园散文在80-90年代所呈现的忧患主题，学者和评论者往往将焦点集中在“感时忧国”或“感时忧族”（黄锦树，2022，页133）上——毕竟“华社忧患”是马哈迪时代华文抒情写作的主旋律。然而，何国忠的校园写作横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贯穿了学院派散文从兴起到成熟的全过程。他创作跨度长、视野宽广，远非那些早夭的校园写手可比。因此，单一的“感时忧国”已不足以概括他复杂的忧患内涵。随着何国忠从青年学子成长为人文学者，他的“忧患心理”亦不断演变深化，呈现出多维度的结构。

从1989年的《班荇谷灯影》到1995年的《塔里塔外》，再到2002年的《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何国忠的忧患书写展现出清晰的演进轨迹：由“感时忧国”的现实介入，经过“感物吟志”的个体省思，最终升华为“人间情怀”的文化超越。这三重维度并非简单的线性更替，而是如螺旋般交织共生：既延续了传统士人先忧后乐的精神谱系，又在当代华裔知识分子的实践中开拓出新的思想疆域。何国忠散文的独特魅力，正来源于忧患意识的多重内涵与理性沉稳的艺术表达并举。一方面，他赋予忧患意识以广阔的人文视野，使之涵盖从族群苦难到人类关怀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他那理性克制的叙述风格——“不渲不染”的笔调——既是对传统文人沉郁风范的继承，又融汇了现代学者的理性思辨。他避免情绪化的宣泄，将深邃忧思融入平实冷静的文字，使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这样的风格既是其知识分子性格的写照，也为学院派散文注入了独特的理性光辉，提高了作品的审美层次。

总而言之，何国忠的“学院派散文”以忧患意识为内在驱动，以理性克制为基本书写特征，呈现出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历程，也勾勒出其思想关怀由时代现实逐步转向人文议题的演进轨迹。“天下之忧”这一传统理念，在其当代实践中获得新的诠释方式：既关注华社现实处境，也延伸至对文化遗产与人性问题的持续思考。本文突破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家国忧思”的单一视角，指出何国忠的忧患意识并非停留于族群命运层面，而是在散文书写中逐渐展开为一种面向人文精神的思想取向。其学院派散文可理解为一种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展开的知识分子书写实践，并为理解马华文学中学理探索与人文关怀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条具有启发意义的观察路径。

参考文献

- 陈大为 (2009)。《马华散文史纵论 (1975—2007)》。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陈蝶 (1991)。细雨狂飙含笑过——回顾与展望马华散文七十年。载于戴小华、柯金德 (主编), 《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页 177)。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 陈平原 (1993)。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 (5), 75-80。
- 何国忠 (1995a)。《班荇谷灯影》。十方出版社。
- 何国忠 (1995b)。《塔里塔外》。十方出版社。
- 何国忠 (2002)。《文化人的感情世界》。嘉阳出版有限公司。
- 黄锦树 (2022)。在马哈迪时代抒情。载于张锦忠、黄锦树、高嘉谦 (主编), 《马华文学与文化读本》(页 373)。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潘碧华 (2004)。八〇年代校园散文所呈现的忧患意识。载于陈大为、钟怡雯、胡金伦 (主编), 《赤道回声》(页 292-304)。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徐复观 (1969)。《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篇》。商务印书馆。
- 曾维龙 (2011)。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政论写作。曾维龙 (主编), 《批判与寻路: 90 年代马来西亚华社评论写作》(页 45 - 72)。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 钟怡雯 (2009)。《马华文学史与浪漫传统》。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钟怡雯、陈大为 (2007)。《马华散文史读本 1957—2007》(第 2 卷)。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